

# 翻译批评之“相”与“非相”问题刍议\*

杨镇源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1731)

**摘要:** 由于执着“忠实”和“通顺”等效果表象,翻译批评难免陷入种种偏见乃至困惑中。究其原因,种种效果表象不过是翻译在偶然因缘条件下呈现的“相”,如同无根浮萍,无法代表真实的价值内涵,更难以担当翻译评价的最终依据。在浮云刹那与瞬息万变的因缘条件下,“相”不仅无法承担翻译评价的重任,而且只会使人们与翻译的真实价值内涵渐行渐远。本文基于人本主义精神,致力于使翻译批评回归人心本原,使其超脱对“相”的执迷,着眼于诸相背后的“非相”,由此从“凝滞于物”的枷锁中获得解脱。

**关键词:** 相;非相;执相;破执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7)03-0092-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7.03.017

##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ssue of Representation and Non-representation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Yang Zhen-yua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Inevitably translation criticism is lost in prejudices and confusions due to obstinate adherence to effectual representations like fidelity and smoothness. The crux resides in the groundless nature of representation under incidental conditions, for which value is not truly represented, and thus translation criticism is absent from a firm pedestal. Under the transient, changeable and incidental conditions, the illusion-like representations fail to bear responsibilitie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isolate human psyche from the real values of translation. Established on humanis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turn translation criticism to human psyche by turning the focus from representation to non-representation. Hence a relief is obtain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 psycho-hinder enslaved with extra-psychic fetters.

**Key words:** representation; non-representation; enchantment; enchantment-relief

翻译批评常被各种问题困扰,主要是评价者过分执着于“忠实”、“通顺”、“归化”、“异化”和“信达雅”等效果表象,进而产生偏见所致。从根本上讲,翻译的价值内涵不在于其自身呈现的“相”,而在于这众相背后的“非相”。要把握翻译的真实价值内涵,就有必要将翻译批评心性化,破除对诸相的执迷,向诸相背后的“非相”靠拢。

### 1 翻译批评“执相”的困境

翻译批评往往依赖于某些标准,而对标准的

把握,批评者容易执着于某种既定的效果表象,进而画地为牢,偏执一隅。一旦在实际评价过程中发现标准所规定的“计划”赶不上纷繁复杂的实际语境“变化”时,则难免遭遇困窘。就以“忠实”标准为例,它标榜“译文须忠实传达原文”,这似乎天经地义。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种种文本外因素的影响,翻译并不适宜“忠实传达原文”。如在一个性观念较为封闭的国家,译文可能须删去原文中赤裸裸的性描写;另如在赞助人的影响下,译文可能须改写原文中令赞助人反感的内容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翻译价值论研究”(13XYY001)的阶段性成果。

等。在此类语境中，“译文忠实传达原文”的效果表象并不适宜作为翻译的价值追求。事实上，某些翻译行为正是因为因地制宜，不拘泥于“忠实”标准的效果表象，才取得瞩目的成就。试想，若非严复大胆地把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译作桐城文风十足的《天演论》，又何来那句影响数代中国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果林纾不突破原文的语言风格，把小仲马的《茶花女》译成中国古典小说味道浓厚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让中国知识分子在喜闻乐见的文风中享受阅读，又何来“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游子肠”的哀婉悲歌？若非路德“大逆不道”，将《圣经》严肃庄重的原文译为德国妇孺皆知的通俗语言，又何来该译本对德意志语言发展的重大贡献？在这些实例中，如果译者拘泥于“忠实传达”的效果表象，在翻译中局限于对原文的一味模仿，那么上述名译恐怕也难见诸于世了。再以与“忠实”齐名的另一个标准——“通顺”为例。译者追求译文通顺，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译文通顺”的效果表象在很多时候也不宜作为翻译的价值诉求。如意识流大师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通过杂乱无序的语言来表现意识的断层和紊乱状态，成就了作品的美学特征。如果译者将其译为流畅的语言，那么这种美学特征就会损失殆尽。再如在新古典主义时期法国译坛“归化”风气的影响下，有些译者将外语作品译为通顺的法语，结果剥夺了读者领略异域风情的机会，也让法国译坛在引入他者、推动民族语言和文化发展方面远逊于同时期的德国译坛。在此类情形下，如果执着于“通顺”标榜的“译文流畅”的效果表象，翻译批评也难免窘迫。如果把这种拷问思路运用于其它标准（如“信达雅”、“归化”和“异化”等）所主导的翻译批评中，可发现类似的困境依然存在。

这些问题暴露出翻译批评因为“执相”（执着于效果表象）而流于片面与武断的一面。归根结底，这些被标榜的效果表象只能代表翻译在某种具体语境中偶然的价值诉求，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如何不为效果表象所累，从更深层面把握翻译的真实价值内涵，应当成为翻译界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 2 “非相”：价值内涵的根本

在对“相”的理解方面，佛家有深刻的认识。在佛家看来，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因缘际会，如梦如幻，如水面上的气泡，如镜中的虚影，如清晨的露珠，日出即散，如雨夜的闪电，瞬息即逝。因此，“一

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佚名 2007: 74）。由于万物皆是因缘和合而成，并无自性，所谓“缘起性空”，即是人们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都只是外在表象，而非其真正形相。在《金刚经》中，佛陀教导，“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佚名 2007: 222）。“相”是事物的外在表征，是一种阐释性话语，绝非事物的实在，事物的真实本质最终隐藏于“相”背后的“非相”中。如同一个水杯，从正上方看是一个圆，从正侧面看是一个矩形，从斜侧面看又可能是一个不规则的几何图形。但无论是圆形、矩形还是其他不规则几何图形，都只是水杯在因缘际会（摆放位置与观察者的观察角度等）下所呈现的“相”而已，都不能成为水杯本身。

这让人不禁想起康德的观点：人们眼中的世界源于世界本身却不等同于世界本身。确实，“相”不过是人们在主客观条件聚合（因缘际会）下对事物的阐释，而“非相”才是这诸多阐释背后的世界本身，佛家称之为“自在”，康德称之为“物自体”。由此看来，虽然“相”源自“非相”，但前者不过是人们在偶然、随机的因缘条件下对后者的某种解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后者，却并非后者的实在。在这一问题上，德里达借鉴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界别，指出语言在指号过程中存在“延异”（*différance*），即一方面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即 *to differ*（异），另一方面在时间上存在推迟，即 *to delay*（延）（Derrida 1972/1982: 10 - 11）。依照这一思维，“相”作为一种阐释性话语，它在人脑中唤起的意象根本就不是原来存在的那个事物，而是在空间上有所差异、在时间上有所推延的一个抽象概念。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它让我们以为我们头脑中的印象就是事物本身。在阐释性话语与事物本身的关系方面，本雅明强调，前者如同人们对于后者产生的共鸣，如同回旋于森林里的回声，“如同一条切线与一个圆轻轻相交但却只在一个点上——是相交而非相交的点确立按其直线无限延续的法则”（本雅明 2005: 11）。在本雅明看来，阐释性话语只是共鸣和回声，是事物本身千千万万的一个切点，与事物本质差之千里。在这一精妙的比喻里，阐释性话语与事物本质的关联性以及相对于事物本质的虚幻性显露无遗。

可见在评价问题上，如果把阐释性的“相”直接当作本质性的“非相”，就难以把握事物的真正价值内涵。其实，伦理学界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明确区分事实与价值，确定事实

(相)不能成为事物价值内涵的本质载体。休谟早在18世纪就指出,从“是”或“不是”为联系词的事实命题,向以“应该”或“不应该”为联系词的价值命题的思想跃迁是不知不觉发生的,既缺乏相应的说明,也缺乏逻辑上的根据和论证(休谟2009:505-506)。这个主张演变为后来元伦理学界对于价值和事实的界分。如摩尔根据休谟的观点推演出“善”的不可定义性。对摩尔来说,如同马的四蹄一尾不能等同于马本身一样,被公认的善行也只是“善”(价值)的外在表现,不能与“善”划等号。如果无视这一点,在价值和事实之间划上等号,那么便是犯了所谓的“自然主义谬误”(摩尔2005:15)。黑尔则指出,任何道德判断都不可能是纯事实陈述,原因在于从一系列关于“其对象的特征”之陈述语句中,不可能推导出任何关于应该做什么的祈使语句,因而也无法从这种陈述语句中推导出任何的道德判断(黑尔1999:32)。这种“事实/价值”的界分思维实际上明确“相”与“非相”在评价体系中的关系。“相”仅仅是一种事实表征,无论这种表征看似多么天经地义或大逆不道,都无法决定事物本身的价值内涵。只有“相”背后的“非相”才是事物的本质,才是价值内涵的根本。翻译批评也是如此,如果痴迷于“忠实”、“通顺”、“归化”、“异化”和“信达雅”等表象,甚至想依靠它们来把握翻译的价值内涵,十分不可靠,甚至会因为对“相”的执迷产生偏见,陷入简单、教条乃至武断的评价思维中。因此,翻译批评如果要克服偏执、狭隘、僵化的评价思维,从根本上把握价值内涵,就须要突破对芸芸众相的执着,走向其背后的“非相”。

### 3 破执:翻译批评的心性化

翻译批评之所以执着于“相”,根源在于一种舍本逐末的评价观,即片面强调“忠实”与“通顺”等表面效果,却忽略价值问题的心性根本。如果能将翻译批评心性化,把价值这一人心衍生的问题纳入人心的层面考察,明晰本末,便能够走出事实表征,对诸相觉而不迷,向“非相”靠拢,进而把握翻译的真正价值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翻译标准标榜的“忠实”、“通顺”与“信达雅”等事实效果都只是某种因缘条件所促成的“相”,它们浮于人的本心之外,如梦幻泡影一般,瞬息万变,转瞬即逝,因而不能成为翻译价值内涵的本质所在。其实,“忠实”、“通顺”与“信达雅”等效果所具备的价值并非客观存在,而是根源于人的主观意识。不可否认,价值产生

的直接因素在于人类主观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如水对口渴的人产生价值,食物对饥饿的人产生价值等,但价值的本体最终还是在于人的主观意识。正如六祖慧能所言,“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佚名2007:161)。王阳明也说过,“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王阳明2011:34),即赋予客观事物价值的不是他物,而是人心。所谓旦夕祸福,悲欢离合,实则都在人的一念之间。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早就提醒人们,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休谟把“德”(价值)看成行为主体内心基于天性结构的“感觉”,即人们在观察一定行为或认识与思考一定对象时,在心中所产生的某种感觉与情感,认为“发生德的感觉只是由于思维一个品格感觉一种特殊的快乐。正是那种感觉构成我们的赞美或敬羨……就像我们关于一切种类的美、爱好和感觉作出判断时一样。我们的赞许就涵摄在它们所传来的直接快乐中”(休谟2009:507)。史蒂文森则将“善”(价值)定位于事实描述背后的一种“情感意义”(史蒂文森1991:92-93)。作为情感的价值,也就是前面王阳明口中的“意”,即为“心之所发”,因此价值问题须要回归到其根源——人心,方能最终得到解决。在翻译批评中,将价值目标指向“心之所发”产生的效果,却忽略其人心根源,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它容易将译者带入“执相”的泥潭,使其为“忠实”与“通顺”等浮于外形的表象所累,甚至丢弃自己的心之根本,将种种转瞬即逝的“相”当作翻译的价值本质,而对诸相背后稳固真实的“非相”视而不见。这些表象如无根浮萍,无法成为翻译评价的依托。并且一旦实际情况与预设情况产生偏差,种种因缘(时间、地点、人物、人际关系、社会环境等)发生变化,其假定的价值内涵便会如泡影一般烟消云散。如一篇在某位批评家看来十分优秀的译文,在其他批评家看来可能会一无是处;一个备受称赞的译本在多年后可能饱受诟病;甚至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语境中,一位译者本人都可能对自己的同一部译作有完全不同的评价,这样的例子在翻译界数不胜数。如果痴迷于这样的无常之相,翻译批评便会离翻译的真实价值内涵越来越远,走上心为物转的迷途。

反之,如果能充分地认识到“相”的浮变性和非本质性,将翻译批评心性化,译者便能摆脱对诸相的偏执,回归价值的人心本原。如《维摩诘经》所言,“一切诸法,如幻化相……一切言说,不离是相,至于智者,不著文字,故无所惧”(佚名2010:

43)。只有回归到人心根基,对“忠实”、“通顺”与“信达雅”等表象效果觉而不迷,翻译批评才可能从一种狭隘的心态中走出来,上升到“不离是相”而又“不著文字”的“无所惧”心境,在纷呈万象的背后抓住翻译的价值本质。心性化的翻译批评是一种“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佚名 2007: 36)的批评,它不住于诸相,进而生出明辨是非之心。如王阳明所言,“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王阳明 2011: 57),从而“悉知众生来去相,善于诸法得解脱”,在“达诸法相无挂碍”(佚名 2010: 11)的心态中破执去障,走向诸相背后的“非相”。着眼于“非相”的批评不刻意追求翻译到底是呈“忠实”、“通顺”、“归化”、“异化”或是“信达雅”等何种“相”,而是超脱这些效果表象,对翻译不轻易赞赏或妄加指责;它基于人心中的良知来把握价值内涵,是一种由心而发的真实心灵体验,因而更符合人性,更贴近人的本质存在。

近年来,翻译界已经开始突破对效果表象的执迷,转而从人心的角度重新思考翻译批评。如曾高举“异化”大旗的韦努蒂就澄清自己的翻译观,宣称他所谓的“异化”并不是一种翻译策略,而是在译文中表达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一种道德态度;他指出“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并非对立概念,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郭建中 2008: 43)。对于韦努蒂来说,采用异化的话语策略不是故意要使译文显得不通顺,而是在实践语境中求得译文一种新的可读性。“因为,译文毕竟是植根于译文的语言和文化之中的。但这种新的可读性可以让读者注意到翻译对外语文本的从属地位和外语文本中的语言 and 文化的异质性,从而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给读者阅读的愉悦。”(郭建中 2009: 37)因此,其异化观看重的是对差异是否持尊重态度,至于译者在实践语境中取得的是“归化”还是“异化”效果,则不是重点。由此,韦努蒂将“异化”标准从一种单纯的效果表象追求上升到一种基于人心的道德态度。学者切斯特曼则主张,将翻译的价值追求纳入翻译职业的伦理意识中。他甚至仿照古希腊医生职业伦理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提出翻译职业伦理的“圣哲罗姆誓言”(Chesterman 2001: 153)。可见,翻译对于价值的追求不再仅仅是一种对于“忠实”与“通顺”等效果表象的追求,而是翻译从业者自心道德反思的结果。孙致礼也认为,翻译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抛开

忠实或不忠实的标准,转而探讨译者的伦理或职责问题,这样不仅可以开拓研究视野,捕捉到翻译规律,而且可以进一步认清忠实的实质(孙致礼 2007: 14)。简言之,“忠实”不再停留于单纯的效果目标上,而是一种发自职责感的伦理心态。它反映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对翻译评价问题的反思,即放弃对表象目标的痴迷,转而从人心出发来把握实践语境中翻译的价值内涵。

#### 4 结束语

翻译批评对“忠实”、“通顺”与“信达雅”等效果的痴迷反映出人对“相”的痴迷,是人放弃心之根本,对于身外之物的痴迷。在浮云刹那、瞬息万变的因缘条件下,如梦幻泡影一般的“相”不仅无法承担翻译评价的重任,而且只会使人心与翻译的真实价值内涵渐行渐远。在回归人心本原的基础上,从对诸相的执着中超脱出来,向“非相”靠拢,这能充分释放批评者作为人所具备的巨大内心力量,走向“心能转物”的大自在与大解脱。

#### 参考文献

- 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A]. 翻译与后现代性[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郭建中. 韦努蒂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08(3).
- 郭建中. 异化与归化: 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第二版评述[J]. 中国翻译, 2009(2).
- 黑尔. 道德语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摩尔. 伦理学原理[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5.
- 史蒂文森. 伦理学与语言[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孙致礼. 译者的职责[J]. 中国翻译, 2007(4).
- 王阳明. 传习录[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1.
- 休谟. 人性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佚名. 金刚经·心经·坛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佚名. 维摩诘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Chesterman, A. 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 [A]. In: Pym, A. (Ed.), *The Return to Ethics* [C].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1.
- Derrida, J. *Margins of Philosoph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1982.